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臺灣史相關研討會回顧

李翊煊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這半年期間，與臺灣史密切相關的研討會有 4 場，多以中央研究院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等研究單位為主，其場次分別為由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於 8 月 5 日舉行的「食物史研究工作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 8 月 25、26 日兩日所舉辦的「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由臺灣研究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及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於 9 月 10 日所主辦之「臺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於 9 月 23 日所主辦的「臺灣研究在東歐暨 2016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以及中研院臺史所於 10 月 21、22 兩日舉行的「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二）」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場次介紹

首先「食物史研討工作坊」中，分別以「魚鱸」、「香蕉」、「味素」及「城市農業」四個主題為主。郭忠豪的〈薄如蟬翼：明清中國的魚鱸食俗與消費文化〉為首場，提到在中國歷史上魚類的食用方式因魚肉容易腐壞，因此多以搭配各式調味料及佐料進行「熟成」，並以宋元時期為分界，探究中國歷史上對於魚鱸、魚生的

食用習慣及地區變化。由魚鱸的發展可以看出傳統飲食上的改變，並可看出在地理環境及燃料取得與否，對於飲食習慣上的影響與變化。接著為藍適齊的〈「臺灣香蕉」的形象，1900-1940 年：以日本國內與中國的消費市場為對象〉，主要以日治時期臺灣對外輸出至日本及中國的消費歷史發展，探究日本與中國的社會大眾，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形成消費臺灣香蕉的「品味」與習慣，以及其背後的社會或文化意義。另外，針對中國而言，20 世紀初期的中日關係衝突使得中國的知識階層視日本為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帝國主義者，因此於 1910 年代起不斷出現由民間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而至 1930 年代「臺灣香蕉」在中國卻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九一八事變後香蕉亦成為抵制的一環，然處理方式卻與其他日貨有著十分不同的樣貌。在中國，臺灣香蕉雖被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一環，但卻又是消費大眾所喜愛的珍貴進口食物，因而產生了矛盾的二重形象。蔣竹山所發表之〈近代東亞的感官、消費與城市文化研究：以味素的全球史為例〉，則是以味素的製作以及在日本與臺灣的推廣進行探究，並讓味素這類食品產業研究並非僅探究日治時期的產業特色與消費文化，更拉高至全球史的研究範疇。而 1920 年代後，味素不僅只在日本進行販售，更流通至臺灣、滿洲及上海等地，甚至連美國亦可見其蹤跡，並開始出現仿冒品，由 1924 年的統計中可知，偽造味素的

金額可達 1 萬圓以上，此種仿冒風潮直至戰時仍存在，而在上海則可觀察到日本味素與中國味素之間因抵制日貨而出現的競爭與消長。透過跨區域、跨界及全球史等研究視角，味素的研究不再僅限於日治臺灣的文物史書寫，而可進一步探究整個東亞地區的消費與社會發展，並帶出帝國下的商業、技術人群等移動與關聯。最後則由周序樺發表“Chinatown and Beyond: Ava Chin, Urban Foraging, and a New American Cityscape”，以文學的角度，透過整理美國作家 Ava Chin 的作品及城市農業的發展與進程，探究食物的生產以及城市採集農業的興起與對於食物的看法、轉變。由文學作品或是書籍、廣告等變化，探究美國「城市農業」從 1960 年代發展至今的變化，以及針對「城市農業」的意象，及何謂「城市農業」的論點與形成爭論的因素為主軸，進而推展出「城市農業」的發展史及其關注的面向。

接著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舉辦的「第九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該會係延續著文獻館近年來致力推動以檔案為基礎的臺灣史研究。藉由黃紹恆所主講之〈史料與社會科學的歷史研究〉可知，近年來文獻史料的運用不僅侷限於歷史學研究，而是擴及至社會科學的部分。故透過社會科學的理論及研究，可觀察出不同的歷史面相。由於該研討會文章投稿數眾多，無法一一介紹，但其內容多元且全面，透過來自日本與臺灣的研究人員及學者的討論下，議題包含

初期的抗日研究，以及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殖民活動、統治政策、警察律令、司法制度、公共衛生、文化教育、產業經濟、金融體制，及原住民政策等，可說是由政治層面的文書資料進而探究在日治時代下臺灣人的生活方式。李為楨的〈日治初期臺灣金融秩序之建立與維持——非銀行組織之管理為考察〉及顏義芳的〈支撐庶民產業經濟金融機關信用組合之解析〉，探究在日本政府帶來現代化銀行制度後，對於臺灣庶民或是地方社會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並探討臺灣地方社會面對此不同於以往的金融制度，如何去回應與調整。范燕秋的〈日治時期臺灣公共衛生與飲食營養：以營養缺乏症「腳氣病」為例〉與鈴木哲造的〈日本治臺與對外宣傳——以 1911 年德勒斯登萬國衛生博覽會為例〉，可看出日本統治時期下，對於臺灣公共衛生的政策方針及所代表的政治意涵。吳育臻的〈政權交替與蕃租（蕃地）的流失：以阿里山蕃為中心〉及曾獻緯的〈理番政策的一個側面：清末至日治初期宜蘭叭哩沙的番產交易〉中可見，日本政府統治臺灣後對於臺灣原住民的生活乃至身分認同與轉變均帶來影響。該研討會討論了日人統治下臺灣現代化的金融秩序的建立與維持、公共衛生與飲食營養問題、不同於清代的告官結構、日治時期的治安維持法與日人引進的現代化司法體系等議題、臺北第二工業學校學生罷課，以及比較日本政府在面對與臺灣同樣為近現代才進入日本版圖的沖繩，所

推行的舊慣調查及統治政策，與臺灣有何異同。復藉由爬梳清代史料文書及總督府公文類纂等資料，探究清代的撫番政策（劉銘傳的「開山撫番」）以及政權交替下「蕃」租（「蕃」地）流失、以及理「番」政策中的「番」產交易等情況。發表人和與談人多為在臺灣史學界深耕多年之研究人員與學者，故在探究層面上更加多元與全面。

而「臺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則是少數將關注焦點拉至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的研討會，透過聚焦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至中華民國政府來臺這段期間，探究臺灣人在身分以及國籍轉換下的變化，與會學者從中研院的研究員謝國興、許雪姬及副研究員吳叡人，乃至各大學的助理教授及博士候選人等，探究之議題多元。其中王昭文的〈文協右派人士戰後的參政之路〉及邱士杰的〈待機和徬徨：試論 1930-40 年代的臺灣島內左翼〉、林瓊華的〈戰後臺灣左翼者赴中國前夕的政治思辨〉，其內容包含日治時期的右翼左派人士之發展、左派的思辨，在政治光譜的討論上更加多元。而陳佳宏的〈二戰結束前後「半山」權力角色之分析〉藉由透過左右派的思想與發展及「半山」等群體結構，試圖分析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的政治生態與運作方式；而劉士永的〈遁入臨床的臺灣醫界菁英〉則分析臺灣醫生於國民政府來臺之際，紛紛由第一線退出轉而進入臨床實驗。許雪姬〈1930-40 年代楊雲萍、陳逸松等活躍文

化人士初探〉分析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臺灣文化人的活動與發展，探究在政權轉變之時，臺灣知識分子是如何自保或是如何與新政權和平共存。最後吳叡人的〈戰後初期在日臺獨運動論述初探〉，則為藉由探究戰後初期在日臺獨運動論述，來思考「臺獨意識」是如何發展。而值得注意的是，本場研討會的內容並非單一聚焦於政治權力的分配，而是以各層面的發展及變化，探討當兩個政權交替之時對於臺灣人及臺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進而分析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臺灣社會的複雜變化及權力的重組與分配。

而「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二）」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延續 2014 年的重點，將重點聚焦於人群網絡發展及互動上，透過探究日治時期內因政策或是生活所需，而於島內游移或是移居海外的族群互動，重新定義理解何謂「臺灣人」的族群概念。日治時期臺灣人在島內的遷徙活動不外乎因為求學或是工作，有時則因血緣或是地緣而集體移動，而這種情況則多半為了生活，在政策或社會網絡的影響之下，在臺灣這塊島上形成了極其複雜的人地關係，「臺灣人」不再僅限於某一群人的專屬名詞，變得多元且複雜，更加凸顯了殖民政策下所造成「臺灣人」的複雜性，而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及現在化經貿活動的介入下，跨境的臺灣人亦不算少數。由鍾淑敏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東南亞〉及許雪姬的〈臺灣人的「滿洲經驗」〉可以看出臺灣人的移動並非僅侷限

於島內，而是因為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或是經濟等原因，其活動範圍擴及東北亞的滿洲及東南亞等地，形成一個跨界的生活圈。而林蘭芳的〈跨域仲介：日治時期大倉商事與臺灣工業機械之引進〉及蔡龍保的〈「國策支援」與「企業經營」之間：中日開戰後日本土建會社鹿島組之動向為例（1937-1945）〉可知，日治時期除臺灣人會因政策等原因進行遷徙外，日本本土的商事等亦會與臺灣總督府或臺灣本土企業合作進行跨境的人群移動，此種現象可知日治時代下與臺灣有關的跨境活動，多與政策及經濟貿易有所關聯，而非如同清代多僅單純因祖籍、地緣或是生存空間而造成的島內人群移動。

最後則為「臺灣研究在東歐暨 2016 年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年會」，該研討會主要是以臺灣人與東歐的關係為主要的研究議題，帶出臺灣人在東歐的發展或是影響，此研討會呈現出臺灣的歷史影響並非僅限於亞洲，而是擴及至東歐等地。從本場研討會中可知臺灣的歷史並非僅聚焦於臺灣島內或是亞洲地區，而是可置於世界史的脈絡下去進行深探。

三、結語

近年來臺灣史的研究日漸多元，由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的研討會內容，即可看出臺灣史的研究不再像以往一樣，多以政策變化、轉變等政治層面的研究為主，而是透

過政策去窺看當時的庶民生活，甚至是以庶民或是民間生活、互動為主要探討對象。而歷史脈絡的部分也不再僅以「臺灣史」這樣僅關注或著眼於臺灣島內發展去處理所有議題，而是將臺灣史及發展脈絡放在東亞史、海洋史或是世界史的脈絡下去探究，企圖拉高臺灣史討論空間的可能性及能見度，更從研討會的類別裡看出，近數十年臺灣史學術界所推行的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方式，依然蔚為風潮。

另，近年來族群史或是食物史等以往被認為非主流的主題也日益發達，族群史的部分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首先針對日治時期，學界透過臺灣總督府檔案、口述歷史或是相關文書等資料，用以研究釐清在日本殖民時代的時空底下，人群是如何遷徙、移動甚至形成那個時空下必然出現、存在的人際網絡或社會關係；另外一個則是透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紀錄且提及的「理蕃政策」，去探究日治時代的「蕃人政策」及當原住民面對日本這樣一個現代化國家時，他們是如何去面對這樣一個與清代截然不同的國家勢力。又或著透過日治初期的紀錄與清代開港通商以降的文獻資料進行比對，試圖帶出日人是否承接清代的理番政策（及劉銘傳推動之「開山撫番」），抑或是自成另外一個脈絡與體系。食物史則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甚至逐漸成為主流的一個研究，透過「食物」的發展探究人類的歷史進程，甚至近現代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興盛之時，食物亦變

成資本商品或國家力量的象徵，而商品的多元性亦可以看出全球化等趨勢；也因為食物史的研究層面甚廣，可發展至社會歷史變化、庶民生活乃至國家的經濟殖民政策等面向，故成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焦點。

然而回顧這半年來的研討會內容則可發現，其中與原住民相關議題可說是少之又少，不僅高山族的議題較少，甚至平埔族群的討論議題幾乎是缺席的，因此從整體而言，雖可說臺灣史研究的主題日漸多元，也不再侷限於國家層面，而是逐步往社會文化或庶民生活的層面發展，但關注的焦點依然多以主流社會或漢人為主要的觀察焦點。今年8月1日新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而緊接著於9月底讓平埔族群以一個大群體的方式正式承認了平埔族群的身分，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轉變下，冀望能夠有更多的相關研究或是議題得以呈現在臺灣人的眼前，讓臺灣史的研究議題更加豐富與多元。